



中山大学学术丛书

近代中美



交流研究

梁碧莹 著

者

China & America

中山大学出版社



中山大学学术丛书

近代中美



交流研究

梁碧莹 著

者



China & America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梁碧莹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5
(中山大学学术丛书)

ISBN 978 - 7 - 306 - 03287 - 4

I. 近 II. 梁 III. 中美关系—文化交流—研究—近代 IV. G125 G171.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5423

出 版 人: 叶侨健

策划编辑: 邹岚萍

责任编辑: 邹岚萍

封面设计: 曹巩华

责任校对: 丘力芬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市新明光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960mm 1/16 23.5 印张 469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本书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梁碧莹，广东省广州市人。1963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培养工作，著有《简明中美关系史》（合著）、《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编有《美国与近现代中国》（合编），并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前言 误解和扭曲近代中美文化交流 是对“西潮”的病态回应

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而文化则是精神的源泉，然而，任何文化都有优长，也有局限。中国与美国，一个是古老的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璀璨的文化；一个是新兴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和学术先进。两个国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有过正常的交往，也有过不正常的冲突。毫无疑问，两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都对对方发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国与国的关系，除了不正常的一面外，也必有其正常的一面。人类在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 and 智慧，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文明与非物质文明，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所以，研究中美两个大国的文化交往同研究两国的外交、政治、经济交往一样重要。近代中美文化交往是在一种不正常的格局下进行的，然而，文化也有其相互影响的特质，任何人想对不同文化加以切割、制造文化的对抗和矛盾都是徒劳的。中美的发展路向不同，但两国人民都有一种期盼：共享文明的善果，和平友好，共同进步。

文化关系在中美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我国在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中，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专著之多为世人瞩目^①，但大部分著作的内容主要突出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涉及文化关系者较少，谈中美文化关系的，多数又倾向于某一文化关系的专题研究。^②从总体上看，关于中美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实为中美关系史研究中较为薄弱一环，这有历史原因，也有认识上的原因。

① 蒋相泽、吴机鹏主编：《简明中美关系史》（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乔明顺：《中美关系第一页——1844 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11—1950》（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熊志勇：《中国与美国——迈向新世纪的回顾》（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胡礼忠、金光耀、顾关林：《从望厦条约到克林顿访华——中美关系（1844—1996）》（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陶文钊：《中美关系史》（全 3 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项立岭：《中美关系史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仇华飞：《早期中美关系研究（1784—1844）》（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等等。

②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张注洪主编：《中美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何大进：《晚清中美关系与社会变革——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历史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张济顺：《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1953）》，（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等。

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应该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外来文化是迎还是拒？这是个极为敏感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具备两大要素：一是内在的，自身的更生创新的能力；一是外来的，在吸取外来文化中得到丰富和补充。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因素总是交互影响的。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来文化影响中国本土文化，这是外部因素在起作用；中国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迎还是拒，则是内部因素在起作用。

对待中外文化，孙中山曾提出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吸纳西洋文化精华，然后加上自己的创见来建构自己的文化模式。他认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无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应该是“取其善果，避其恶果”，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是具有前瞻性的思维。北京大学季羨林先生对于西方文化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西方文化确有它的优越之处。19世纪后半叶，中国人之所以学习西方，是震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在以后的将近100年中，我们逐渐发现，西方不仅是船坚炮利，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方面，他们都有许多令人惊异的东西。想振兴中华，必须学习西方，这是毫无疑问的。”^①他认为，吸取外来文化对于本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应随时吸取国外的文化成就作为本国文化的补充，这是肯定无疑的，也被无数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态度。但是，外来文化也不一定样样都符合中国的历史土壤，吸取外来文化，不能盲目拿来，应择善而从，做到优势互补，为我所用。外国好的文化，如果不能适应中国的需要，当然不能吸纳；外国好的文化对于中国有好处的，当然不能拒绝，也拒绝不了。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因接触而彼此吸收，中国吸收了外国文化以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融合、改造使之变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中华民族历来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也历来善于创造和发展人类文明。近代中国，由于受西方列强的侵略，致使人们对西方文化往往产生不同的心态：一种是崇洋媚外，主张全盘西化，凡是西方的东西都拍手叫好，主张无条件地、全面地照搬西方；另一种是盲目排外，拒绝一切外来文化，固守本位文化，自以为自己的文化一切皆好，这是对西方文化扭曲、对中国文化误解所产生的病态反应。这两种对外文化观造成对立的文化心态，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已经发生的文化历史。如果我们不端正态度，面对奔腾澎湃的“西潮”，我们就会更加无所适从，无路可走。正如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所说：

由华东沿海输入的西方文化，却是如潮涌至，奔腾澎湃，声势慑人；而且是在短短五十年之内涌到的。……要想吸收这种文化，真像一顿要吃好几天的食物。如果说中国还不至于胀得胃痛难熬，至少已有点感觉不舒服。因此中国一度非常讨厌

^① 季羨林：《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见《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页。

西方文化，她惧怕它，诅咒它，甚至踢翻饭桌，懊丧万分地离席而去，结果发现饭菜仍从四面八方向她塞过来。^①

这些情况的出现，妨碍我们正确地审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也妨碍我们更好地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这些经验教训必须记取，要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就必须端正心态。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受到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并不是件坏事。文化交流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大动力，中国文化的发展前途，就是要走文化交流、中西融合之路。研究中美文化关系，只有对美国文化有较深的了解，才能在接受美国文化时更具理性的分析，才能分辨美国文化哪些可以学，哪些不能学，不必学；美国人提倡的哪些价值观可以认同，哪些不能认同。美国人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规划了一套文化政策来影响其他国家，他们幻想全人类都认同美国的文化，照着美国人的价值观行事，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这就需要我们去了解，了解愈多，选择就愈清楚。对中国来说，创造新文化，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需要充分了解，深入研究。对中外文化了解得越深，研究得越透彻，就越有分析和有鉴别，也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抉择，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正常的中外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既包括西方文化的输入，也包括中国文化的输出。然而，近代中美文化交流史与今天的中外文化交流不一样。今天的中外文化交流是在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中进行的，是一种新的双向的中外文化交流。而在近代，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外文化交流更多的是单向的，或是只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或是让西方各种思潮自发涌向中国，因此，近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以西方文化走向中国为主，这是近代中美文化关系史的一大特征。当然，也不能忽略中国文化走向美国和世界，同样也产生过极大影响。如“五四”时期中国人大力批判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英国人罗素却在讲中国文化的好处。不过，也要注意一种现象，有时，中国文化被介绍到美国时，由于美国人的错误导向而往往被扭曲了，把支流的东西歪曲为主流的东西，这种误导大大破坏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因此，我们在进行中美文化交往时，既要科学地辨别美国输入的西方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也要注意美国文人在传入中国的文化时，将其糟粕大肆渲染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在近代中美文化交流中，作为媒介的有传教士、外交使节、留学生、商人、军人，有非基督教的文化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等，其中尤以传教士、留学生在文化活动中最为活跃。作为交流的途径，既有通常的途径，如官方派遣使节、互派留学生、官方与民间团体交往等；也有属于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如宗教的交流。即使是在战争年代，也仍然

① 蒋梦麟：《西潮》，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版，第256页。

有文化交流。所以，中美文化交流不受时空和环境的限制，但人为的阻碍带来的影响则不容忽视。

中美文化关系包括的面很广，一部书不可能全面地反映其方方面面。本书重点就美国与中国的教育事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以及美国传教医生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美国在华的教会大学和美国在中国的出版事业作一个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重点考察在近代中国文化活动中，中美文化的互动、互补和产生的影响，以说明中美文化交往同政治、经济的交往一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正如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所说：美国“它远隔重洋，它的文明与东方文明根本不同，属于西方基督教文明范畴，却对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发挥特殊的作用，是近代世界文化史上值得研究的一个特殊现象”^①。

美国传教士在近代中美文化关系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美国传教士来华，只担负传教使命，不担负介绍基督教以外的中西文化的使命。但是，中国人对基督教表示出极大的冷淡。在处处碰壁后，传教士使用各种手段开始了间接传教，于是，他们通过办学、行医、译书、办报等活动，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出乎意料，中国人对传教士间接活动中所传播的西学表现出很高的热情。所以，美国传教士在华传播宗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而传教士在华办学，进行医学、译书和办报等活动，更是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交流。

留学是文化交流的产物，留美学生的活动是中美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通过中国留学生的几次赴美高潮，分析留美学生在沟通中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近代留美学生，肩负着西学东渐与华风西被的双重任务，他们既是西方文化的吸纳者，又是构建中国新文化的前驱。留美学生不仅为中国建立了许多新兴学科，而且还涌现了许多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留美学生绝大多数不失为魂系祖国、故土的爱国主义者。如，1912年11月，曾在中国海关工作过的英国人布兰德赴美到处发表演说，竭力诋毁中国，激起中国留美学生的义愤，胡适写反驳文章寄往《纽约时报》刊登，中国留美学生会还召开特别会议，商讨抵制办法。胡适在会上提出建议，设立通讯部，把英美各报反对中国的言论翻译成中文，寄登国内各报，“以求警醒吾国中人士，促其消除党见之争和利禄之私，为国家共谋救亡之计”。又如，1914年5月，胡适以《论英诗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一文获康奈尔大学征文奖，获得50美元奖金，美国各大报相继报道。胡适也引为殊荣，喜不自胜，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区区五十金固不足齿数，然此等荣誉，果足为吾国学生界争一毫面子，则亦‘执笔报国’之一端也。”可见，中国留美学生把个人的荣誉与祖国的荣誉联系在一起。总体来看，留美学生在中美文化交流

^① 罗荣渠：《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30页。

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教会大学是舶来品。早在19世纪30年代,教会学校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到了20世纪初,教会学校已逐步完善,形成了包括初等、中等、高等各层次的完整体系。在这发展的过程中,美国、英国的新教团体尤热衷于教会大学的兴办,美国在华建立的教会大学已达十几所,这些教会大学造就了一批区别于旧式文人的知识分子,这一大批人才,活跃在海内外学术、科技、医学和宗教界,成为中坚力量。尽管人们对教会大学作过林林总总的评价,但不能否定,教会大学对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教会大学引进了欧美先进的教育制度,输入新的教学法和新的课程设置,等等,均对中国教育起着示范作用。至于教会兴办的农学、医学和女子大学,既是教会大学的重要特色,也直接体现了教会在这些新学科的开创之功。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是基督教徒或是非基督教徒,他们中大多数均以所学的知识回报祖国,走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之路,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在文化传播方面,图书、报刊无疑都是最重要的载体。美国在华的出版事业也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包括美国在华的报刊业、美国在华的翻译活动以及美国在华的出版印书机构等等。在近代中国,外国人在华办的报刊大部分是由英、美、德、加等国的新教传教士创办的。其中,美国投入了很大力量,从办报的数量到质量均有一定的比重。美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办报活动对近代中国的文化、中国报刊事业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翻译西书是引进西学的一个重要途径。译书对于开拓中国人的视野,沟通中外文化的往来,打破传统思想的桎梏,起着重大的影响。在近代中国,引进西学的要求,促进了译书事业的发展,而译书事业的发达,又是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突出特点之一。早期西学书籍的翻译,一般都采取西译中述的方式,即由外国学者用粗通的中文口译西书意思,经过中国合作者润色加工,条理成文。中国合作者只能通过外国学者口述了解西书内容,并且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接受、理解。

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在中国有三家出版西学书刊的机构: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学会,这三大机构均有美国人参与翻译出版活动。此外,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创办的“美华书馆”,以及基督新教创办的“益智书会”,也翻译和出版了颇为丰富的西书。值得注意的是,西学译书和西学刊物引进了西方近代多种学科和新的价值观念,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人们的思想更新,为近代中国科学发展及社会进步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同时,一批中国翻译家和学者也在与外国人共同合作的学术活动中成长起来。

广州是中美关系的缘起地。从古代到近代,广州是个历久不衰的外贸城市。1784年8月,美国商人乘坐“中国皇后号”商船来到广州口岸,中国和美国的水路接通了,

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在 18 世纪的广州揭开了序幕。继商人之后，第一批美国传教士也来到广州口岸，广州就成为中美经济、文化交往的汇聚地。“洋行、教会、买办、西医院、新闻纸等等，以双管齐下之势，使西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广州汇聚，并向内地扩散，成了中华大地得风气之先的‘南风窗’”^①。因此，本书每一章都花较多笔墨阐述近代广州的中美文化关系，诸如马礼逊学校、容闳与第一批留美学生、美国传教医生与西医学在广州的传播、基督教人士创办的岭南大学、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中国丛报》、裨治文撰写介绍美国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

作者力图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以往研究者的成果和立场观点作必要的分辨，用历史事实客观地评述近代中美文化交往中的各种问题。为探索历史文化因缘，说明历史真相，力所能及地引用了各种中外文献和书籍，其中使用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尤其充分引用亲历、亲见、亲闻的当事者对某一史事的评论和看法，这些评论和看法既具真实性和可信性，又有历史感，从而使逝去的历史得以还其本来面目。探索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以及中美文化相互间的影响、互补，有利于我们客观公正地对待各种文化，也有利于我们明晰和捕捉世界文化体系的主脉络，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创新和坚定我们的文化走向。

^① 蔡鸿生：《〈广州与海洋文明〉序》，见蔡鸿生：《学境》，香港博士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4 页。

目 录

前言 误解和扭曲近代中美文化交流是对“西潮”的病态回应	(1)
第一章 嫁接在中国土壤上的西方教育	(1)
第一节 马礼逊学堂	(1)
一、马礼逊教育协会	(1)
二、布朗与马礼逊学堂的创建	(4)
三、1842—1850 年的马礼逊学堂	(6)
四、西式教育开风气	(8)
五、杰出的学生——容闳、黄宽、黄胜	(11)
第二节 同文馆里的美国教习	(23)
一、京师同文馆缘起	(23)
二、从学外语到“采西学”	(26)
三、总教习丁韪良	(33)
四、同文馆的整顿与发展	(40)
五、翻译西书和第一批翻译人才的出现	(47)
第三节 退还庚款与中国教育	(56)
一、本来是中国人的钱——呼吁退款	(56)
二、庚款用于教育合情合理	(59)
三、共识多于歧异的争论	(62)
四、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65)
第二章 走向美国的学生群体	(70)
第一节 第一批中国留美学生	(70)
一、留学教育计划的批准	(70)
二、开风气创世纪的幼童赴美	(75)
三、教育方法的争议	(80)
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87)

第二节 庚款留美学生	(91)
一、退款兴学	(92)
二、清华学校的建立	(95)
三、留美高潮再起	(103)
四、“庚款兴学”议	(105)
第三节 留美学生与西学东渐	(110)
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与留美教育的变化	(110)
二、留美学生对科学的传播	(117)
三、留美学生对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影响	(124)
四、留美学生在西俗东渐中的作用	(131)
第三章 西医学在华传播	(137)
第一节 美国传教医生与西医学在广州的传播	(137)
一、伯驾与广州眼科医局的创设	(137)
二、“中华医学传教会”	(148)
三、嘉约翰对西医东渐的贡献	(150)
四、“医学传教”的积极作用	(163)
第二节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医学的发展	(168)
一、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医学的投资	(168)
二、从“旧协和”到“新协和”	(172)
三、霍普金斯医学模式的输入	(174)
四、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的足迹	(179)
第四章 教会与大学	(184)
第一节 教会大学的缘起和发展	(184)
一、早期教会大学也有其功劳	(184)
二、教会大学的发展与西方教育的影响	(189)
三、教会大学面临新挑战	(192)
四、教会大学的调整	(198)
第二节 形式多样的教会大学	(203)
一、新教各教派自办的大学	
——圣约翰、之江、沪江、东吴	(204)

二、新教教会团体合办的大学	
——燕京、齐鲁、金陵	(210)
三、基督教人士创办的岭南大学	(220)
第三节 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	(227)
一、富有特色的医学、农学教育	(227)
二、创女子高等教育的先河	(234)
三、西方教育对中国的影响	(239)
第五章 美国在华的出版事业	(246)
第一节 美国在华报刊业	(246)
一、美国在华报业的发展	(246)
二、裨治文与《中国丛报》	(254)
三、林乐知与《万国公报》	(261)
四、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275)
五、《大陆报》与《密勒氏评论报》	(278)
六、中美新闻界交流的兴起	(284)
第二节 美国在华的翻译活动	(287)
一、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美国译员	(288)
二、广学会及其西书翻译	(298)
第三节 出版物与印刷机构	(309)
一、基督教印刷所与西方印刷出版技术的传入	(310)
二、益智会及其出版物	(313)
三、美华书馆	(321)
四、出版教科书的机构	(325)
附录一 英汉译名对照表	(336)
附录二 中外文献参考书目	(345)
后记	(358)

第一章 嫁接在中国土壤上的西方教育

第一节 马礼逊学堂

马礼逊学堂是嫁接在中国土壤上的西式学堂，它于1839年在澳门创办，1842年迁往香港，1850年因经济拮据而关闭。与我国早期西式学堂相比，马礼逊学堂颇具规模，办学时间较长，又有一定影响。以它为典型，可以管窥我国东南沿海尤其是香港早期西式学堂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马礼逊教育协会

传教士兴学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开始。第一位来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抵华后，便把设立培养宗教人才的学校作为一项活动计划，但由于当时中国尚处在禁教时期，他便选择邻近中国的南洋马六甲作为基地筹建学校，并于1818年9月创建“英华书院”。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于1830年2月在广州设立了贝满学校（Bridgman School），这所学校规模很小，只有四五名学生，并且举办不久就关闭了。^① 贝满学校影响并不大，但它毕竟开创了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办学的历史。

1834年8月1日，马礼逊在广州病逝，这一消息引起了在华英美传教士和商人的极大反应。在华的英文报刊《中国丛报》以较大的篇幅刊登了马礼逊牧师逝世的讣告，并介绍他的生平与事迹。^② 为纪念马礼逊在华从事的基督教传教事业，1835年1月26日，广州、澳门等地的英美传教士和商人倡议成立“马礼逊教育协会”，得到广泛的响应，一场慷慨的认捐活动就此展开，捐资者、出力者颇为踊跃，出现了英美商人出钱、出物，传教士出人、出力的场面。从1835年1月26日至2月24日，已有22人在倡议书上签名，很快便筹集了4860英镑捐款。倡议书指出：“为把马礼逊博士开创的事业继续推进，我们建议，以马礼逊博士毕生奋斗的目标为本会的宗旨。马礼逊博士惊人的毅

①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

②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3, pp. 177 ~ 184.

力、高尚的品质已为历史所证明。为纪念马礼逊博士，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本会定名为‘马礼逊教育协会’。”倡议书还指出协会的宗旨：“本会以在中国设学校、促教育为宗旨，根据中国自身特点，向中国学生教授英语的阅读和写作，使之能以英语为媒介，了解西方文化。”根据会议记录，当时该会已有 5977 英镑的基金（包括利息），并拥有一座藏书 1500 册的图书馆，书籍内容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其他方面。^①

容闳在其《西学东渐记》中曾记载马礼逊教育协会的建立及其宗旨：

1834 年 8 月 1 日，马礼逊博士卒于中国，其翌年 1 月 26 日，乃有传单发布于寓澳之西人，提议组织马礼逊教育会，以纪念其一生事迹。并建议设学校，及设施他种方法，以促进中国之泰西教育。^②

1836 年 9 月 28 日，马礼逊教育协会在广州正式成立，随后组成了董事会，以英商颠地为会长，霍斯为副会长，查顿为财务（司库），裨治文为通讯秘书，马礼逊之子马儒翰（1834 年继其父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罗宾臣的华文翻译）为文书。从马礼逊教育协会董事会组成可看出，前三人是广州的英国洋行商人，他们是协会主要的经济支柱，而实际出力主事者却是裨治文。

马礼逊教育协会的宗旨是以办学和其他方法促进和改善中国教育。至于如何促进和改善中国的教育，该会又具体解释为：“通过建立或支援中国创办学校，使中国青少年受到教育，让他们学会说、写英文，并以此为媒介，使他们接受西方的各种学问，《圣经》和关于基督教义的书籍乃学校必读之物。”^③ 董事会全权管理协会事务，董事必须居住在中国，每年的 1、4、7、10 月的第三个星期三召开会议，讨论会务，但须三人出席方能成会。每年 9 月最后一个星期三召开会议，进行董事会选举，以无记名投票选出。凡一次捐赠不少于 25 英镑或每年捐赠不少于 10 英镑者，可为马礼逊教育协会会员，会员在常会中有表决权。协会的经费由募捐、赠予等方法筹措。^④

马礼逊教育协会的主要活动都集中在马礼逊学堂的创建和运作中，协会的 10 届年会也主要讨论学校事宜，几乎每年都开年会：

①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pp. 373 ~ 375.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 页。

③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pp. 374 ~ 375.

④ 关于“马礼逊教育协会章程”，参见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pp. 375 ~ 376.

年 会	时 间	地 点	主 席
第一次筹备会	1835 年 2 月 24 日		
第二次筹备会	1836 年 9 月 28 日		
第一届年会	1837 年 9 月 27 日	广州美国第二商行	颠地
第二届年会	1838 年 10 月 3 日	广州商行	颠地
第三届年会	1841 年 9 月 29 日	澳门布朗住宅	颠地
第四届年会	1842 年 9 月 28 日	澳门布朗住宅	裨治文代
第五届年会	1843 年 10 月 1 日	香港	裨治文
第六届年会	1844 年 9 月 25 日	香港	裨治文
第七届年会	1845 年 9 月 24 日	香港	裨治文
第八届年会	1846 年 9 月 30 日	香港	裨治文
第九届年会	1847 年 10 月 25 日	香港	裨治文
第十届年会	1848 年 9 月 30 日	香港	裨治文

由此可见，马礼逊学堂是由广州的英、美等国外侨倡议，由商人出资捐助倡办的。从这个意义看，学校具有商办教育的性质；但传教士尤为出力，裨治文任协会的秘书，美国传教士布朗总管学校校务和教学，因而又使学校同传教结合起来。不过，该校并不隶属于某一教会，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认为，马礼逊学堂不仅将外国的教育体系带到中国，而且也明显地体现了非教会对教育影响的开端^①。

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传教士如此重视在华开展教育活动，这当然具有自身的目的和需要。教育是传教最有力的辅助手段。传教士来华后，很快就意识到，由于他们的基督教文化和以信仰佛教为主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距离实在太远，他们的福音传播方式难以引起中国民众的共鸣，加上清政府推行严格的禁教政策，更构成传教上的困难。为改变直接传教成效不大的状况，加快在中国发展基督教的势力，教育便自然成为“福音的婢女”加以利用，这就是他们率先在华办学的原因。颠地会长在欢迎布朗来华时，一面赞扬布朗的教育传教精神，一面又反复强调利用办学来进行传教的重要性。寓传教业于教学活动之中，便成为布朗日后办学的基调。

马礼逊教育协会存在的时间较长。马礼逊学堂结束后，协会还设法资助中国儿童教

^① George H. Danton, *The Culture Cont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Earliest Sino-American Culture Contact 1784 - 1844*, New York, 1931, p. 60.

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
4

育。直到1867年，随着颠地开设的宝顺洋行倒闭，协会大部分基金随之丧失。1873年，协会曾提出将一笔款项交给香港政府，以设立一项奖学金，但由于条件不被政府接受，不久该团体也就自行解体，结束活动。

二、布朗与马礼逊学堂的创建

兴办学校，教师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马礼逊教育协会对教师的聘请有明确的规定：视财力情况，将长期聘请来自欧美国家的教师；聘用品行高尚、学识渊博的中国人充任教师。该协会对学校教师的要求甚为严格，在欧、美征聘，经获协会同意后才能聘任。聘期分两种：一为长期聘任；一为短期聘任。马礼逊教育协会成立后，当即向英、美发出呼吁，要求派遣教师前来中国开办学校，经费由协会提供。对这一呼吁，英国没有回应，美国却迅速作出反应。耶鲁大学三位教授答应物色适当的教师，他们推荐了本校品学兼优的毕业生布朗来华办学。

布朗出生在美国康涅狄克州的东温泽，是美国长老会教徒，183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不久，又先后在哥伦比亚神学院和纽约联合神学院攻读神学，毕业后在纽约聋哑学校当教师。1838年应聘来华，成为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教育传教士。耶鲁大学校长杰里迈亚·戴在推荐书中介绍布朗在校期间每门学科成绩优异，其渊博知识赢得人们的尊重；其谦虚优良的品性受到人们的爱戴；其高尚的道德亦受到人们的称赞。信中还肯定这位学生将会坚持不懈地为基督教传教事业而努力。^① 1839年2月19日，布朗夫妇抵达广州，裨治文等人接待了他俩。几天后，布朗夫妇到达澳门，一面学习中文，一面筹备学堂创建。

在澳门，早设有一所西塾，该西塾由英国女传教士温施黛所办。温施黛原为英国妇女教育促进会派往马六甲的传教士，1833年与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结婚，定居澳门，1834年创设该女塾。马礼逊教育协会在筹建学校的同时，招生工作已先期进行。1835年招来的新生寄读于郭实腊夫人的女塾，协会每月付15英镑给该校，作为资助。最早寄读于这所女塾的学生容闳有这样的记述：

古夫人所设塾，本专教女生。其附设男塾，不过为马礼逊学校之预备耳。马礼逊学校发起于1835年，至1839年成立。未成立时，以生徒附属古夫人塾中，酌拨该校经费，以资补助。是予本马礼逊校学生而寄生于此者。忆予初入塾时，塾中男生，合予共二人耳。后此塾逐渐扩张，规画益宏。夫人乃邀其侄女派克司女士姐妹

^①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 567.